

1000牛
西陽文史資料



資 料



第九輯

泗阳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三月

目 录

- 一、中外学术交流的佳话
 记泗阳张家翻译《中国纪行》的经过……张海珊（1）
- 二、胡明复——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夏 安（7）
- 三、张相文与西通垦牧公司
 ——谨将此文献给远征河套的泗阳农民並纪念
 张相文逝世六十周年………张天麟、张海珊（20）
- 四、抗战前众兴镇的粮油贸易商行………刘良耕（28）
- 五、《周广之诗集》诗选与作者简介……倪宾礼整理（32）
- 六、汪桂祥的书法及歌诀………庄美村（44）
- 七、超脱禅师与《昙云集诗》………静 庐（46）
- 八、“满城风雨近重阳”集句与逸叟先生……郑亚西（51）
- 九、桃源巾帼三诗人………严寿夫（54）
- 十、江苏省泗阳县中学简介………臧广甫（65）
- 十一、淮泗教育界佳话小集………庄美村整理（74）
- 十二、我的老师刘逸之先生………陈永昌（78）
- 十三、石钰球艺及其它………美 村（102）
- 十四、泗阳县麻风病防治院和麻风病的防治……静 庐（107）
- 十五、泗阳境内废黄河开发纪实………庄 文（117）
- 十六、我所经历的1974年杨工决口………徐体龙（123）
- 十七、康熙途经泗阳的六次南巡………刘良耕辑录（130）
- 十八、“串馆先生”陈秉恭引导我参加革命………
 ………陈同智口述、奔流整理（146）

- 十九、不平常的中秋节………陈同智口述、奔流整理（151）
二十、故乡行……………陶兴嫖（153）
二十一、三台阁话旧……………庄美村（156）
二十二、对“城厢乡”“城厢街”命名的我见……………
……………张天麟（160）
二十三、《南园丛稿》解隐语及纠误……………张天麟（164）
二十四、泗阳婚俗程序歌——喜话……………庄德新（168）
二十五、阅稿札记二则……………胡茂功（177）
补白：
 1、脱靴坊……………（159）
 2、第五届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181）

中外学术交流的佳话

记泗阳张家翻译《中国纪行》的经过

张海珊

中亚穆斯林阿里·阿克巴尔的波斯文名著《中国纪行》，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回历922年、公元1516年）作于奥斯曼帝国京城君士但丁堡，它记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容饶有趣味。其中有些记载独一无二，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习而不察的东西，尤其显得宝贵。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但是本书的基调却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达到相当高度的国家，充满了奇迹般的事物，到处都有着令外国人羡慕称赞的景象。作者在第四章里甚至说：“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如果穆斯林们能这样恪守他们的教规——虽然这两件事无共同之处——他们无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人。”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前院长保尔·卡莱教授曾经中肯地指出，此书的学术价值犹如第二部《马可波罗游记》。保尔·卡莱是欧洲热心于研究和翻译《中国纪行》的著名学者，曾在三十年代与印度穆斯林哈密都拉分别用德文和英文合译此书，将两种译文并列一纸，各占半页。但在中国，首先研究《中国纪行》并与保尔·卡莱有着合作关系的则是泗阳张星烺。

张星烺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翻译过《马可波罗游记》，出版过六大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他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开山人物，在德国的东方学界享有盛誉。保尔·卡莱在研究和翻译《中国纪行》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只有中国学者才能解决的困难，非常需要懂德文的中国同行专家给予帮助，便在1934年与张星烺通信，并将其《中国纪行》德文译稿寄给张星烺一份，请求注释其中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事物、以及人名地名和职官等等。张星烺答应了卡莱的要求，先注释了译稿第四章，以后又逐章进行注释，并和儿子张至善一起跑到北京牛街清真寺调查访问，拍了照片，拓下该寺最早的阿拉伯文碑文，一起寄给卡莱。关于这些，卡柏1940年在伦敦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曾有详细记载。他说：“我结识了北京的张星烺教授，他是一位研究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中国权威……他精确地研究了我寄给他的此书译本，并给我寄回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卡莱还说：“张星烺在给我的回信中写到：‘我家在北京三十多年，但从未去过阿里·阿克巴尔所说的礼拜寺。现在读了你译的有关阿里·阿克巴尔的叙述，我去了那里。这是中国仅有的一一个教长职能保持在一个自称为撒德·本·阿比·瓦戛斯的后代同一家族中的礼拜寺。瓦戛斯是伊斯兰教主的著名随从，按照传统被派送到广州来的，这个家族的第一个教长姓王，是十五世纪中叶到北京来的。我和这位与阿里·阿克巴尔有过关系的教长后裔谈了话’。张星烺还寄给我一些礼拜寺和那位教长的照片。礼拜寺中竖立着一些石碑，是一些穆斯林宦官们立的。碑文有中文的，也有波斯文的（其中一个文本有拓片）。”（见中文本《中国纪行》附录七）。

从1935年起，保尔·卡莱教授便着手争取张星烺到波恩大学任教，以便共同研究和译注《中国纪行》，出版德、英、中文译本。接着，张星烺也在北京《地学杂志》1936年第二期发表《德文译本阿梨爱克伯尔之〈中国志〉(Khitay name)之介绍》，“将其书中二十章之内容大概约略叙之”，作为“全文翻译之初步广告”。中国读者从此始知世界上还有《中国纪行》一书。但好事多磨，邀请信通过官方渠道送到中国后，竟被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扣压，他们提出了别的人选，想要调包顶替。卡莱教授回答说：“这些人可能在一般文化宣传上有用，而我要做的事是纯科学的研究，这只能是专家的事。张星烺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关系史方面的权威，他已给我极有价值的帮助。我不考虑别人，只要张星烺。”（见意大利都灵大学卡莱图书馆所藏卡莱信稿）。经过如此交涉。南京外交部的调包计虽然破产，但是芦沟桥事变接着发生，卡莱教授的努力终于白费。当张星烺将自己的一位学生推荐到波恩帮助卡莱工作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十分嚣张，卡莱只得在1938年纳粹大暴行前逃亡伦敦，中德专家合作计划遂成泡影，两位神交数年的学者终身未能会面。后来几经沧桑，张星烺的藏书、手稿、信件也都荡然无存。

但是，张星烺的儿子和卡莱的儿子均未忘怀此事。当改革开放之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以后，张星烺的儿子张至善教授便在1982年10月给德国波恩大学写信，说明原委，请求寻找保尔·卡莱教授《中国纪行》德文译稿和有关资料。信先寄到该校中亚语言及文化研究所，很快就得到该所海思希教授的答复。他说经仔细查找，该所并无保尔·卡莱之书，愿代转询该校东方研究所。1983年2月，张至善又收到波恩大学东方

研究所所长许茨因格教授的来信，说他亲自和全所人员一齐查找了研究所和波恩大学的藏书，均未发现卡莱前所长的遗书、遗稿，唯一希望是请求其子在卡莱教授遗物中寻找，并允代为联系。1983年3月，许茨因格教授再次致函张至善，说他找到了保尔·卡莱教授的一个儿子汉斯·卡莱，时任联邦德国驻突尼斯大使，得知保尔·卡莱教授去世后，遗书、遗稿赠给了意大利都灵大学，该校设有卡莱氏图书馆，负责人是瓦拉罗博士。不久，汉斯·卡莱大使也致函张至善，告以上述情况，并称他还记得其父与张星烺合作研究之事，今如有人能够继续此项工作，将是很大欣慰，并以良愿相勉。

在汉斯·卡莱大使关怀下，1983年4月，意大利都灵大学瓦拉罗博士即主动致函张至善，说他仔细查找了保尔·卡莱教授的数箱遗稿，其中确有他和哈密都拉的译文手稿和张星烺致卡莱的信件以及卡莱的有关信稿。如有需要，可以商量阅读办法。国外学者送来的这一喜讯，激起了张至善完成父辈未竟之业的决心。但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教授，要跑到意大利去阅读这批社会科学资料，可非易事，不但手续难办，而且也不可能申请到必要的经费和外汇。面对德意两国学者的热情，只能望洋兴叹和等待时机而已。然而瓦拉罗博士了解情况后，即与德国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现任所长许茨因格教授商量，决定此事由他处理。他将数百页手稿、书信精心复印，邮寄至罗马，声明作为意中人民之间的友谊，将它赠送给张至善个人。最后，在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安排下，这批宝贵而又沉重的复印资料，终于由北大蒋忠新先生从罗马带到北京，交到张至善手中。

张至善在得到瓦拉罗博士赠与的复印件后，即开始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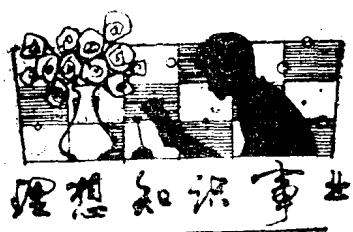
读，依据哈密都拉的英译稿並参照卡尔·保莱的德译稿进行翻译和注释，至1984年4月译完。

但是，无论是德文译稿还是英文译稿，对于波斯文的《中国纪行》来说，都还是第二手的东西，且有疏漏，要译出一部完善的中文译本，舍掉波斯文本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波斯文的《中国纪行》本来只有美术体手抄本，保尔·卡莱当年翻译此书，是将法国东方学家谢费在1900前后过录的手抄本影印，作为依据的。直至1981年，才有伊朗学者阿夫沙尔将美术体手抄本整理出版，他在前言里曾经提到卡莱与张星烺的合作。1984年12月，阿夫沙尔获悉张至善翻译《中国纪行》，欣然将其整理出版的新波斯文本《中国纪行》赠送一册，由北京大学张鸿年教授从伊朗带来。恰好张星烺的堂弟——中国中东学会秘书长张铁伟就是懂波斯文的（他是张鸿年教授的同行和朋友），于是立即进行翻译。当他在岳家明同志的协助下，将阿夫沙尔的新波斯文本《中国纪行》译出来以后，便与张至善的译文进行比较，进行逐章逐句的讨论，将两种译文融合成一种译文，既坚持了信、达、雅的原则，又弥补了德英文译稿所带来的疏漏。付梓前，英国李约瑟博士和北大季羨林教授都热情为之作序。1988年，泗阳张家在半个世纪前就为之绞脑汁的第一个中译本《中国纪行》，终于在三联书店出版问世。文前插图十六幅，既有保尔·卡莱和张星烺的照片，也有他们饱经沧桑的往来书信。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连同半个世纪后许多外国学者热情支持此项研究的动人事迹，对于读者的启示是不亚于《中国纪行》本文的。文后附录外国学者研究成果10篇，中国学者研究成果3篇，不但为读者提供了完备的参考资料，而且也把这个中译本的价值衬托得更加

明显。1988年10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术座谈会，纪念张星烺诞辰100周年，并向与会的中德学者赠送了刚刚出版的《中国纪行》中译本。

1988年10月22日张至善同志亲自寄赠一册《中国纪行》给泗阳政协，作为纪念。本书现藏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编者注



胡明复——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

夏 安

编者按：上海市卢湾区政协编印的《卢湾史话》第三辑（名人专辑）中转载夏安先生发表在《科学》杂志第43卷2期原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路小工胡明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教育世家一脉承”一节中写道：“……胡明复祖父胡丽荣（字和梅）出任桃源县（今泗阳）教谕，生有四子：壹修、雨人、合如、保如。胡壹修生明复輩子女10人，胡壹修与弟胡雨人皆热心教育、实业……”根据这个资料，编者查阅了民国版的《泗阳县志》及中国地理学家张相文先生的《南园丛稿》中刊载的张星烺先生编写的《泗阳张池谷（即张相文）居士年谱》中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胡丽荣先生出任桃源县教谕是从清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三十年（1904），长达二十年之久，而胡明复则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从这里可以看出，胡明复出生时，正是胡丽荣在桃源任教谕期间。

从《泗阳张池谷居士年谱》中，可以从多处看出张相文与胡丽荣的交往甚密，更可以看出胡丽荣在桃源县期间对教育事业作了很大贡献，如年谱中载：“光绪十一年（1885）……无锡岁贡生胡和梅（胡丽荣）先生来为泗阳教谕。先生为人，

和蔼可亲，培植士类，如恐不及。募建王忠节公祠堂，筹拨夫子庙岁修田租，建藏书楼于淮滨书院，购置经史子集数万卷储之，士风由之丕变，邑中诸生，先君（张星烺称其父张相文）最为垂青，早年多蒙其提携。”“光绪三十年（1904），……无锡胡和梅先生任桃源教谕二十年。本年，邑有农家钱立本之子读书应试，为劣绅所扼，先生极力援之，卒因以去职。桃源地方偏僻，风气不开，所有新教育，新知识，皆由先生传入，桃邑青年出外读书者，多由先生介绍引导。去职后，人人扼腕。”

从以上《泗阳张沛谷居士年谱》中文字述叙，不仅说明胡和梅在泗阳任教谕时间较长，对泗阳教育事业之建设与人材之培植，付出很多心血，同时还可以看出胡和梅与张相文之私人交往甚密。泗阳现在新编之《泗阳县志》亦收有“胡明复传”，但资料不细，为了供泗阳了解胡明复兄弟之情况，特转载此文。

不得意的少年时代

胡明复，名达，又名达生，字明复，后以字行。江苏无锡堰桥村前村人。生于1891年5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由于家庭对教育的重视，胡明复辈兄弟很早开始读书。长兄胡敦复于1897年南洋公学开办之初即考入肄业，明复与弟刚复10岁前都在家中读书。明复生时不足7个月，幼时身体弱小。刚复比他小1岁，两人生活起居、读书游戏都在一起，但两人性情迥异。明复天性聪颖，心灵手巧，“会弄锁、裹粽子、补衣裳”，精于计算，但记性不如刚复，故

读书悟性虽好，成绩则不如刚复。而刚复身伟貌奇，性情耿直，记性尤佳。两人常常打架。明复平日沉默寡言，“终日除读书衣食外无半语”，偶尔也调皮。1900年，义和团运动掀起的冲击，使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其父胡壹修率明复、刚复及四叔保如北上至淮城省亲，在当地“延师课读，且令明复兄弟从日人某试习东文。”

1901年，明复与刚复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当时任公学总办（相当于校长）的张元济先生对明复兄弟颇赏识，“尝抚二人之肩称为奇童”。南洋公学是清末洋务派中坚盛宣怀于1896年创立于上海的，其目的在于为洋务事业培养人才，其附小（当时称下院）是公立小学中最早的一个，所开课目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体操8项，附带学一点英语。胡明复就这样踏上了通向现代科学的第一级台阶。

附小第一批学生72人，至1903年有明复兄弟等十余人毕业升入中院，可是不久因兄弟二人打架而被南洋公学双双开除，家里遂决定把明复贬往宜兴一家货店——亿和成洋货号，名是习商，实为学徒，这一去便是一年半。在店期间，因家中与该店经理稍有关系，所以一直受着特别待遇。他好读新书及西文，被店中同事称为“洋先生”。明复的母亲薛夫人贤达开明，尤重子女教育，明复辍学之事使她掉了不少眼泪。祖父因担心他在店里学些“大爷的脾气”，也有意让他出来。这时长兄胡敦复在外跟随马相伯、蔡元培等名士游学、二姐胡彬夏与华桂馨（敦复聘妻）也在1902年由叔父胡雨人送往日本留学。对比之下，明复不免焦急，不愿继续留在店里，回家向父亲提出自愿进海军学堂学习，终于在1904年

秋进入上海商业中学。自此，他精于计算的才能开始显露。在商业中学期间成绩优秀，“每次考试不是第一，便是第二”。1907年，胡敦复与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胡彬夏同去美国留学，那时正好是胡明复从商业中学毕业的时候，在从城里回家乡的小舟上，众人祝贺敦复、彬夏取得的好成绩，母亲自豪地说：“三弟这次毕业也名列第一”。大家欢呼：“三个第一！三个第一！”

第二届留美庚款生

商业中学是初中水平的实业学校，胡明复在此毕业后又入南京高等商业学堂继续学习。高等商业学堂相当于高中水平，明复在校期间成绩依然很好。此时，他的弟弟胡刚复考取首届庚款留美生一事，使他深受触动。1909年，是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为此成立了游美学务处，下设游美肄业馆于北京西北郊（清华大学前身），负责甄别、培训中国学生。已自美归国的胡敦复被聘为教务长，综理一切事务。刚复得大哥帮助，准备应考课程，经过一番努力，顺利通过了严格的考试，与梅贻琦、金邦正、秉志等成为首批留美庚款生，1909年8月赴美入学。

弟弟的出国留学，比哥哥姐姐留学美国所产生的震动更强。明复不甘落于人后，也要去考庚款生，于是给大哥写信要求投考。敦复基于他以前的表现和当时的学习基础，拒绝了他的要求。明复又给父亲写信求援，经三方多次函商，敦复才答应给他半年的较简单的课程，如果半年内能完成再寄给他下半年的课程。

此时的胡明复，文弱的双肩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要上好高等商业学堂的课，一方面要自习应考清华的课程，哪一边都不敢放松。在高等商业学堂最后的一年中，凭着优异的天赋和艰苦的努力，发愤读书。功课很重，但他从不缺课。大哥寄来的留美考试课程也如期完成。结果在学校考试中总拿第一，寄到北京的答卷也使他大哥惊喜叹服。1910年7月，未及毕业的胡明复在北京参加留学考试，这次考试仍沿用第一届办法，首轮考国文与英文，及格者可参加第二轮的各门学科考试。两轮考完，于北京史家胡同发榜，胡明复名列第57位。

第二届共有70人被录取，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周仁等都是这一届留美学生。8月16日，学生们在胡敦复等人带领下从上海乘轮船去美国。船上的十多天里大家都熟了，明复总爱跟赵元任、周仁、敦复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在一群学生中显得与众不同。胡敦复本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所以他送入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也最多。9月，胡明复到绮色佳进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攻读数理课程。这一年，胡刚复进哈佛大学读理科，胡彬夏正在威斯里安大学上二年级，手足四人在异国他乡的波士顿相聚，其乐融融。

来到美国留学，胡明复真正从沉重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像出笼的鸟儿自己飞翔。他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力，选择了他最喜欢的数学。在美国的7年，是他成熟的阶段。在4年大学学习中，胡明复读书用功，成绩优异。他与赵元任所学相同，又同居一室，上课同坐一排，是至好的朋友。1912年胡适从农学院转到文理学院，在克雷登（J.E.Creighton）教授的哲学班上，三人同坐一排，遂成为好友。1913年，三个好友

一起被选为Phi Beta Kappa会员，此种荣誉得之不易，而三位坐在一起的中国学生同时入选，难怪“美国报章传载，以为异举”。明复与赵元任在学习上是激烈竞争的对手，每学期的总平均成绩都在90分以上，赵元任总是多着一分或半分，有一年只相差几厘。在大学4年中，他们每年的总成绩都是最高的。第二年，也就是1914年的5月，他俩又与同学黄伯芹，金邦正一起入选Sigma Xi名誉会员。所以任鸿隽（当时也在康奈尔大学读书）说中国学生这一年大出了风头。

1914年6月16日胡明复大学毕业，1916年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他以题为《有周界条件之一次积微分方程式》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也是中国第一个数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在1918年10月号的《美国数学会会刊》上发表，具有相当高的研究水平（详见《科学》42卷3期“我国最早发表的现代数学论文”）。

科学社的“管家”

1913年初，不愿在袁世凯手下为官的革命青年任鸿隽、杨杏佛同来康奈尔大学留学，共同的志向使胡明复与任、杨成了莫逆之交。一班热血青年，为图救国大业，于1914年6月发起组织了科学社。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值明复毕业在即，同学们又在一起讨论，想为国效力做一点事情。作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他们深知“当时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假如

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而中国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他们要把科学介绍到中国来。6月10日晚，大考刚过，十来个人相约来到任鸿隽的房间讨论组织科学社以出版《科学》月刊，到会者很热心，写了一个缘起，胡明复等9人在上面签了字，他们还拟了一个简章作为凑集资本发行期刊的大纲。

科学社是胡明复“科学救国”理想的寄托，他将心血倾注在科学社上，所以“在科学社的组织上，明复发表的意见很多，也最得同人的赞许。”科学社最初是公司性质的，仅有期刊一项事业，与“振兴科学提倡实业”的宗旨相去甚远，社员中对此有看法的为数不少。1915年6月，董事会派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3人起草新社章。新章程于10月25日由社员全体通过，科学社遂改为中国科学社，这一天定为成立日，胡明复被选为第一届5名董事之一并任会计。他被选为会计是众望所归的。这不仅因为他有几年前学习商业课程的经历，更由于他对科学社事业的无私和热心。刚成立的科学社靠留学生们节衣缩食，从每月60元的津贴中抠出来一部分作为出版《科学》月刊的经费，这种条件下没有一个精打细算、认真负责的管家，科学社是生存不了多久的。创业时期，胡明复和其他几位主要组织者出力最多，捐款也最多。每当遇到困难，捐款名单上明复几个人捐的数目总是最多的。他管理的帐目清清楚楚，在科学社每年的年会上都交上一份详尽的财务报告。后来他去世时接手的人继续工作没有觉得困难。胡明复理财，是他对中国科学社的一大贡献。任鸿隽、杨杏佛等在纪念他的文章里对此都深有感慨。

编辑科学杂志，写稿的工作重要而繁忙，1914年的整个